



认识王秀琴好多年了。知道她还要更早些。身在吕梁山深处,心却寄托在无际的文学世界里。就我认识的人言而,像她这样对文学执著者不能算多。文学是她的希望所在、生命所在、价值所在。这些年,王秀琴一直在写一部关于中国明时著名数学家王文素的传记。这一题材对任何写作者而言,都是一大挑战。首先是知识积累方面的。人们对数学的发展了解不多。如何把数学中的相关内容转化成为文学语言是比较困难的。其次是王文素本人留下来的史料不多。他甚至长时间不为人知。如何把他的一生表现出来也就成了问题。更主要的是,此前王秀琴并没有撰写传记的经验,不知道她能否或者怎样才能合适地把握这样一个充满挑战的题材。也许,对于那些慎重的人而言,回避是最好的办法。因为生活中可写的东西太多了。

不过,王秀琴似乎并不在意这些。也许她本来就没有考虑过。她知道的就是,王文素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是吕梁山孕育成长的一代才杰。尽管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她还是一去不回头地开始了艰难的创作。王秀琴曾经拜访了很多了解王文素的数学家、科学家,可以说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当然也查阅了访了很多相关的史料。这自然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据她说,还竟然按照王文素的演算办法大量地演算数学习题。这使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我们写一位数学家,并不是要自己也成为数学家。

但是,有些憨蛮的王秀琴竟然这样做了。真不知她为写好王文素下了多大的功夫。也许我们这些局外人是难以体会理解的。更让人意外的是,王秀琴并不是写了一本书,而是写了三本书。其中一本是关于王文素的传记小说,一本是具有学术性质的通常意义上的传记,还有一本是散文。这确实令人惊讶,并敬佩她的执著与勤奋。一个人,不论其能力有多大,专注地、认真地、努力地做好一件事就应该得到鼓励与肯定。我想,王秀琴就是这样的人。

王文素,山西汾阳人。他出身于15世纪中期一个中小商人家庭。随父亲来到当时的直隶真定府饶阳定居并经商。这期间,王文素结合自己经商的实践,苦心钻研算学数十年,大约在明嘉靖三年,即公元1524年,年近六旬终于完成了10册30卷50余万字的《新集通串古今算学宝鉴》,亦称《算学宝鉴》,成为我国数学领域具有开创意义的集大成者。其算法,承宋元先河,开明清古制,复杂程度远高于宋之杨辉、明之程大位,甚至直至清时也是独一无二的。其在数学领域的贡献,首先表现在改进了传统的算法,并创立了许多新的算法。在立体图形的插图法上率先采用了现代轴测图中常用的正等测图法等。其次,校正了过去一些算法的错误。同时,其数学理论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特别是珠算的内容极为丰富,使其功能得到了巨大提升。

著名的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曾经指出,在文艺复兴时期以及之前,中国的科技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中国古代科学》中,他写到,“很久以来,西方世界丝毫不知道原来多少类似的革新创造都诞生于中国或亚洲其他国家,但就我们所知,西方发现这一事实后陷入一片窘迫的混乱局面”。他曾经与中国学者曾昭哲在上世纪晚期考察中国与欧洲,认为近现代西方科学、工业革命与现代艺术是建立在中国科技、文化、体制与思想成果基础之上的。但是,李约瑟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疑问,就是既然如此,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产生在17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这一问题的解读应该是多原因的。这里我们并不需要进行详细深入的探讨,但也可以发现一些基本的线索。实际上李约瑟在其《中国古代科学》中也有解读。他认为中国的科技发展是一种“按部就班”或“内部稳定”式的形态,一直坚持一种“缓慢的速度持续发展”。故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近代科学诞生之后,其进步速度大大超越了欧洲。也就是说,在欧洲汲取了中国科技的滋养后,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爆发式发展形态。而中国仍然在一定时期内坚持着“按部就班”式的发展形态。这使人看起来就会感到中国的科技成就比较少,也没有引发科技的快速进步以及工业革命等现象。

实际上除了李约瑟的这一观点外,原因还有很多。比如,一些科技成果是在中国很早之前已经完成的,因而人们并不认为这是近代成果。相反,由于在欧洲是近代以来才完成的,人们却认为这是所谓的近代成果。如李约瑟就指出,中国在公元659年已经有了钦定药典《新修本草》。而西方第一部钦定药典则是1618年的《伦敦药典》。二者时间上相差几千年。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说《新修药典》是近代科技成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对欧洲16世纪以来科技成果的研究仍然不够。如王文素,长期不为人知,直到400多年后的民国时期才被人偶然发现。他的研究中有大量的关于测田量地的计算方法。如梯田截积、梯田截面积、方圆台求积、立圆求积、三角田求面、六角田求面等均均为几何内容。而按照李约瑟的观点,中国数学是“代数”思维,缺乏“几何”思维。或者也可以说,他认为中国数学对几何的贡献比较小。所谓“几何”,其原意即为土地测量,是研究科学的科学。而王文素从实际运用的角度出发,已经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丰富的研究。事实上并不仅仅是王文素对几何的研究有积极的贡献。在中国对几何的研究应该说同样历史悠久。如公元前5世纪,墨翟所著的《墨经》中已有关于几何图形的一些知识。在《九章算术》中已经记载了土地面积和物体面积的计算方法。至于勾股定理、圆周率的计算等更是影响至大。因而,对中国古代乃至近代以来的科技成就,还需要进行更为艰难深入的研究。

不过,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目的并不是要探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史,而是要写出活生生的人。王文素虽然出身商人家庭,其兴趣却在钻研数学。他一生可以说历尽艰辛,默默无闻,不求闻达,不图仕宦,淡薄荣华。在没有优裕的研究条件、财力支持、精神激励的情况下,王文素以研究为人生之至高追求、至大乐趣。这种纯粹的、无功利的精神品格令人肃然起敬,敬佩由衷。他认为数学是“普天之下,公私之间,不可一日而缺者也”。因而王文素对数学的悉心研究首先是有非常浓郁的救世精神。同时,这也是他人生最大的快乐。所谓“陋室半间寻妙理,灵台一点悟玄机”,“料此一般清意味,世间能有几人知?”他虽然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清贫、孤独,却在研究中感受到了人生的意义、价值。这种精神追求与人格操守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至为尊崇的,也是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的。

从王小波想起了果戈理

□杜书瀛

被漠视的一切:络住人生的无谓的可怕的污泥,以及布满在艰难的而且常是荒凉的世路上的严寒灭裂的平凡性格的深处全显现出来,用了不倦的雕刀,加以有力的刻画”。

但是,尽管王小波和果戈理都写喜剧,世间享年也相仿(王小波活了45岁,而果戈理活了43岁),王小波却没有能够成为果戈理那样的伟大作家。为什么?因为在我看来王小波的艺术还没有“修炼”到家——他的某些作品艺术上存在明显的瑕疵,而这些瑕疵不是不可避免或不可修整的;类似这样的瑕疵,通常在果戈理那样的伟大作家那里是不应该出现也不会存在的。譬如我刚才说的那篇《革命时期的爱情》——近乎长篇的中篇小说,窃以为写得不够精细(或者说写得相当粗糙)。它的篇幅拉得很长而结构散漫,从“豆腐坊”的“捉迷藏”到“宿舍楼”的“武斗”,从小屋做到爱到小河游泳……穿结全篇的绳索总是松松垮垮;它情节枝蔓,“老鲁”的“追杀”,“×海鹰”的“帮教”,“姓颜色”的女大学生的亲吻……总是拢不到一块儿;几个主要人物也过于“独立”、过于分散……此外,这部小说的许多语言也锤炼得不到火候。我看他的这部小说若再精练、提纯,长度至少还能压缩三分之一或更多,情节也会更集中,人物也能更精粹。他的一些“历史”小说(我是指《青铜时代》中的许多作品,其实“历史”只是空壳,里面装的是“现实”)也有这样的毛病。可惜斯人已去。倘若20年前他在世的时候,应该建议他学学果戈理。

俄国伟大作家果戈理曾经这样述说他创作作品的情况:

……过一个月、两个月,有时也许还要久些,你再拿出你所写的东西来读一读吧。你会发现有很多不对的,很多多余的,和很多没有达到的地方。你在空白上做一些订正和注解,然后再搁起来。当下次读它时,仍要在空白上添上新的注解,到那里无处可写了,就移到远一点的页

边。当全部都被写成这情形时,你便亲自来把这些文字誊在另一笔记本上。这时就忽然出现了新的主意,于是,剪裁、补充、把词句重新简练一遍。在以前的文字中会跳出一些新的字句,这些字句非安置在那里不可,但这些字句不知怎样却不能起初一下就现身出来。你再放下那个笔记本吧!你去旅行,去消遣,你什么也不要做,或者去另写别的东西。时间一到就想起抛开的那个笔记本了。你拿起它,读一读,用同样的方法改一改,当又被涂抹得不堪时,你再亲自誊一遍,你到这里会发现随着文字的坚实、句子的成功和洁净而来的,是你的手似乎也坚实了起来:于是每个字也更加强硬和坚决了。应该这样做八次!有些人也许用不着这些次,但有些人也许还得多次,我这样做八次。只在这八次的修改!必须是在亲手的修改之后,工作才算完全艺术地了结,才会得到创作的真谛。

啊哦!果戈理原来是这样写作和修改作品的。

果戈理的写作过程伴随着修改过程。对于这位伟大作家来说,写作即意味着修改。他之“慢腾腾”的写作和修改自己稿子的方式,在某些写作快手看来,可能近于“病态”;至少,有点儿“邪乎”,一般作家似乎做不来或不屑于做。

然而,果戈理正是以这种近于“病态”、有点儿“邪乎”的写作和修改,创造出了俄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玉不琢不成器,他的《死魂灵》,他的《钦差大臣》,他的所有作品,都是如琢如磨、精雕细刻、反复修改出来的。单说《死魂灵》,这部世界名著从题材的确定到初稿、定稿,都是不断听取朋友的意见而逐渐构思、写作、加工、修改而形成,而定稿,其中普希金起了重要作用。《普希金文集》中曾经记述过果戈理与普希金的一段交往。有一次普希金看到果戈理一篇文稿的某个片段,大加赞扬:“有了这种推断人和淡淡几笔就把他活灵活现地表现出

来的能力,怎么不动手写大作品?这简直是罪过!”在赞扬的同时,普希金把自己的一个题材交给果戈理——他本想以此写部长诗,他说,他是不会把这样宝贵的题材交给别人的。这就是《死魂灵》题材的来源。这说明普希金对晚辈作家(果戈理比普希金小10岁,创作生涯比普希金晚得更多)是多么器重,多么爱护,多么提携。不久,果戈理动笔写《死魂灵》初稿,并把开头几章念给普希金听。果戈理后来在给茹科夫斯基的信中描述了普希金听朗诵《死魂灵》初稿时的反应:“(普希金)开始慢慢地越来越忧愁,最后竟变得十分郁闷了。朗诵结束时,他用感伤的声调说:‘天呀!我们俄罗斯是多么悲惨啊!’”虽然初稿头几章能打动人,但是,并不尽如人意。于是果戈理在听取了朋友们的意见后,把开头部分完全重新改写写,并且更仔细地考虑了全盘计划。

前面我引述的果戈理那段话,说他的作品要改“八次”;而像《死魂灵》这样的大作,我想可能不止“八次”吧。

这样的写作当然很慢,但慢工出细活儿、出精品。在果戈理那里,每一个句子,都是用思索、用很久的考量得到的。别的作家毫不费力在一分钟内把一个句子换成另一个句子,而在果戈理,则要反复考量。他说他宁肯饿死,也不愿发表没有分量的不加思考的作品。经过了并且深深体验了这样的写作和修改过程,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才能够说:艺术家的一切自由和轻松的东西,都是用过分的压迫而得到,也就是伟大的努力的结果。

如果王小波还活着,应该建议他像果戈理那样,把自己的作品至少“改八次”,精益求精。如果他真能学学果戈理,说不定中国将会出现一位杰出的甚或伟大的喜剧作家。

如果仅仅从这个角度而言,说一句极端的话:伟大作家是“修改”出来的,是“提炼”出来的。当然,造就一个伟大作家,还有其他许多更重要的条件和因素。

思想与文学

——关于里下河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 □黄玲

和研究。我们发现,里下河著名的作家基本上都以小说见长,兴化还被誉为中国小说之乡,这与施耐庵开创的小说传统也许不无关系。我们看一下里下河作家群名单:汪曾祺、毕飞宇、鲁羊、朱文、楚尘、鲁敏、朱辉、庞余亮、刘仁前、顾坚、罗望子、王大进,等等。粗略一看,这些作家之间似乎没有太多相似之处,但读他们的作品多了和久了以后,我们至少可以感受到这样几个共同点:比如,那种整体上温柔敦厚、恬淡内敛的美学风格;比如,专注日常生活,不约而同远离宏大叙事的默契;比如,永远关注人和人的命运,热衷于挖掘人性,并对人性心怀悲悯。这些特点几乎在所有的里下河作家笔下都可以找到。如果我们联系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即道”、“淮南格物论”“明哲保身”“以身为本”等主要思想主张,那么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泰州学派思想对里下河文学非常深远的影响。

再看一下里下河的评论家名单:丁帆、王尧、叶榭、费振钟、王干、汪政、晓华、温潘亚、姜广平、吴义勤、何平等,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应该是找不到第二个评论家队伍如此齐整的地方了。跟里下河的小说家一样,里下河的评论家之间似乎也没有什么共同点:他们有的身居学院,有的在作协文联系统,也有完全脱离于体制之外的自由评论家;他们的文学思想和批评路数并不相同;他们各自擅长的批评领域和方向也不尽相同。但把这些评论家的批评文章放在一起研读,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他们的共同之处:首先,他们的评论都是“在场”和“及物”的。紧跟当下文学创作,及时作出同时代的理论反应,由心出发,贴着文本,敏锐而犀利地说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少有刻板的程式与套路;其次,他们的批评文章都体现着批评家自身的创造,他们的情性与才情。他们有的执著于为思想启蒙呐喊,有的果断地为日常生活的合法性正名,还有的喜欢用近乎苛刻的标准审视文学的语言及其创造的艺术世界,挥洒淋漓,透着浓郁的文人气、才子气;第三,他们都强调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及其自身的文体特征,重视表达的

感,他们的批评文章常常是充满思想深度的美文。可见,里下河的诗性批评传统在自觉不自觉中依旧被今天的里下河评论家们很好地延续了下来。

当然,思想影响文学,它不仅仅表现在上述对文学作品内部的价值立场、叙事特点、审美风格等方面的影响,或者是对文学评论家的理论供给、批评风格、思想追求等方面的影响,思想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对一个地方的社会伦理、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甚至是思维方式的影响,这些影响会在更宏观、更广泛的层面上影响一个地方的文学生态。

最近看到了一套《泰州知识丛书》,这是一套泰州文史普及性读本,用文学和历史相结合的方式,把泰州成为陆地以来的地方知识作了一个系统的梳理。这套丛书令人惊讶之处在于:一是地方政府对文化建设超乎寻常的重视,对地方文化传统记录和保护的高度自觉性,相较于其他地方而言,这真的可以算是现象级的了;二是这套丛书总共50多本,基本上都是本地的作者撰写的,本地竟然有这么多写作者能堪此重任,这真的非常了不起。除了这套知识丛书之外,据说还策划有一套《泰州文献丛书》,是对泰州历代重要典籍文献影印本的汇编。由此可见里下河地区的写作,不仅是文学方面的,还有地方文献整理、地方知识书写等,这种对历史资料的抢救、收集和整理,反映的是一个地方对文化的敬重之心。同时,这些写作也是对地方思想文化的一种诗性建构,它会反过来重塑地方思想文化,并使之成为新的传统。今天的里下河,文风依旧如此繁盛,无疑跟它的思想传统密切相关。

泰州学派的平民意识、思想启蒙意识、对人的尊重,使它的门徒在当时来说是“上自师保公卿、下逮士庶樵陶农渔”;也就是说它的受众很多很广。思想启蒙和文化普及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地方人口的文化素质和文明素养的普遍提高,这也间接地培养了地方上为数众多的写作者人群。因此尽管时过境迁,里下河地区的文脉就这样被广大地方写作者很好地承接

了下来,以至于到今天写作在当地还依旧是一种被称颂、被追随的美德,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文化教育、对文学书写都非常重视。当文学写作成为里下河地区人们自觉不自觉的价值追求,甚至是社会责任和道德驱动时,里下河文学怎么可能不繁荣?

行文至此,我突然对里下河文学研究的路径及其意义有了一个新的想法。虽然里下河文学知名的作家、评论家很多,但里下河文学的成就不应该只体现在它有多少经典作品,或者说它有多少著名作家和评论家,更重要的是这些经典作品背后更多普通的文学写作行为,是这些著名作家、评论家背后更庞大的文学基础人群,正是这些无名的业余写作者默默的写作行为,它更好地体现和诠释了一个地方的文学风尚。在里下河,文学不仅仅是在描写日常生活,而是真真切切地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成了有些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而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这才是里下河文学最值得骄傲的地方。

所以,里下河文学研究不应该仅仅是一种地方文学的研究,也不能仅仅是对几个著名的里下河作家作品的研究,还应该有更深入的里下河地区思想文化和文学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研究,这在文学研究和地方文化研究中都有很强的示范意义。在这个热闹奔腾、价值多元的时代,为众多多的里下河人还会选择安静的文学作为他们介入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情感的场域,这是一种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对文字的信任,是一种长久的文化积累形成的对思想的追求。如果我们能从地方出发,通过考察里下河文学来考察里下河人观察、思考、书写生活的方式和能力,在文学与思想的共生共塑中找到这份信任的神秘线索,通过文学来探究思想是如何在多重、复杂、漫长的过程中影响了个体,如何在一代代传写者的接力中完成了最富有韧性的传承。那么,里下河文学研究就真的可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样本研究。

里下河文学研究专栏

对于文学,我一直有个最基本的判断,那就是不管文学的形式如何变化,也不管其表现的主体是谁,是民族国家,还是普通个体,最终都是思想的深度决定了文学的高度。因此,如果哪个地方文气充沛,文脉悠长,那么按图索骥一路探寻下去的话就会发现,这个地方往往是思想的生产地。历史上,里下河地区是个“水势环绕,风气之秀,发为人文科目之盛”的地方,文脉相当深厚。在长期的韬光养晦中,这片土地终于在明代迎来了本土的大思想家、著名的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学派,泰州学派引领了明朝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对晚明以后的哲学、伦理、社会、政治、教育、文化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和影响。当一个地方有漫长的文明史,而且在这个历史中形成了思想家的话,它对本地的影响当然是尤为巨大的。

思想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呢?它可以以理论或著作的方式存在,但更重要的其实是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与作用。一个地方的思想要影响文学,它一般不会是直接影响,你要随便问个里下河作家或评论家他受什么思想影响,他也许说不上来,因为思想往往是以人们习焉不察的方式,通过民风习俗、地方制度、生活方式等无数中介,先影响个体,再通过个体被建构到文学或文学评论中影响文学,这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但这种通过无数中介影响个体、影响文学的思想却是最有生命力的,因为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所以可以被代代传承而成为一种传统。今天,影响里下河地区人们思想的路径有很多,有当下各种多元的思想理论,也有主流价值观,同样,许多传统的思想也在影响人们的生活,这些传统思想不怎么为人察觉,但一定是存在的。

从施耐庵到刘熙载,从作家到文艺理论家,里下河一带文风繁盛久矣。从2009年的“兴化文学现象”开始,这几年,里下河文学更是越来越受到文学研究者的关注与重视,很多出生或成长在里下河地区的作家和评论家们也开始作为一个群体被讨论